

---

如果研究中、西哲学，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中国的哲学体系一直在研究事物之间的整体关系，而西方哲学一直关注事物可以分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差异，中国的伦理思想家多于哲学家，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也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产物，但当今城市规划的手段却分明来自西方，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种种思潮，表明了西方理性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立场，西学东渐后，战后日本的城市规划吸收了西方的理论思想，丹下健三和黑川纪章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先后提出“新陈代谢”和“有机城市”的理论，对中国的新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西方一直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机械体，而东方则把城市视为乡村中生发而成的一个新的有机体，因此，东方的城乡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棋高一着，但结果却让人很诧异，因为中国城乡发展的格局一直在用西方的手段在解决问题，我们的城市病与西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所犯的毛病是一样的，而且还没有解药，因为中国还碰到一个土地二元制结构的现实制度问题，这是个硬伤，到现在仍在制约着城乡的健康发展和有机融合。

城市规划的最初目标是将城市要素进行有效的整合，而结果往往是城市要素的“有效分离”，这种结果与初衷的背离是与规划手段相适应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雅各布就讨论了种种现代城市中出现的的问题，规划的形态决定了粗鲁的社会形态格局：生硬的街道，没有人情味的街区邻里建筑，宽阔的机动车道和肮脏的后街，高大压抑的高层建筑摩天楼和破落的、失修的老街区、棚户区。种种社会乱象与西方规划体系下的功能分异是一体的。

城市规划中的形、神、韵是“气”，筋、骨、肉是“力”，西方重“力”，东方重“气”，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新城在自我的文化传统上找到城市规划的归宿，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可以失去很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千万不能丢失那来自精神的支撑，相信很多中国人活着活着会发现自己生活在西方人丢弃的规划思想建成的城市中生存，想去找回最本真的“中国”时，却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就像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的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回顾历史上商业繁荣极盛之时，会有一批士人觉悟社会之积弱，许多人选择了归隐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消极的避世心态。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格局以及与乡村的关系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打破的，打破后的格局让城市脱离乡村，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现在所谓的现代、先进之所，是以经济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的，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念也是这一逐利思想的产物，城市中心区的容积率永远是最高的！为什么不是最低的？！我认为城市中心的地位就应该是山水最优美的地方！而容积率越高的地方，应该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集聚区！是产业工人集聚的地区！就像五几年搞工业化大生产，城市里到处是烟囱，纯粹是反人性的规划！——这又是西方规划思想的糟粕，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思想还在原地踏步。

城市规划是一门复杂而有趣的学问，它综合了工程、社会、管理等多学科的知识，它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西方文明的规划重于分析和解构，是理性的表达，

---

东方文明的规划更注重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整合，这是我们的传统，它的精髓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去学习、研究和体会。